

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

章育良

张百熙(1847—1907年)，湖南长沙人。1874年中进士，早年曾授翰林院编修、侍讲，任山东、四川等地乡试考官，并先后任山东、广东两地学政，以后又历任国子监祭酒、内阁学士、工部尚书、刑部尚书、吏部尚书等职。他一生热心教育事业，积极投身教育改革，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。本文仅对其恢复和发展京师大学堂的贡献进行一些粗浅探讨。

1896年6月，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廷的《请推广学校折》中，提议设立“京师大学”，“自京师以及各省、府、州、县皆设学堂”。李端芬这个奏折，据说出于梁启超的手笔，当时流传甚广，影响较大。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，清廷下谕举办京师大学堂，并派孙家鼐管理。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，丁匙良为西学总教习。由于风气未开、顽固守旧之流以入此学堂为耻，因此求学的人极少。有之，也只是图居饮食之便而已。戊戌政变，一切新政都被推翻，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。独京师大学堂“以萌芽早，得不废”。但这时“大学堂虽设，不过略存体制，仍多未尽事宜”。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，清廷迫于时局的压力，不得不以推行新政相标榜，“废科举、兴学堂”成为新政的主要内容。张百熙慷慨时事，力请兴学，遂被命为管学大臣。张百熙早年担任过光绪皇帝的侍读，甲午战争时，曾疏劝李鸿章“阳作战备，阴实主和”。戊戌政变时，又“抗疏陈大计”，积极提倡变法自强，在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中颇得人心。他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后，海内欣然望兴学矣。

张百熙受命以后，“悉心考察，夙夜构思，一面查培养什么样的人，一面预筹将来办法”。他认为“从前所办的大学堂，原系草创，本未详备……今值朝廷锐意变法，百度更新，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，规模宏远，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，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。天下于是审治乱，验兴衰，辨强弱，人才之出出于此，声名之系系于此，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，非徒整顿所能见功，实赖开拓以为要务，断非因循旧制，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”。表明了办理京师大学堂要以“开拓为要务”，要脚踏实地，一切从头开始。他对京师大学堂校舍的筹建、书籍、仪器的采购以及经费的来源等问题一一亲自去办，身体力行。

京师大学堂旧址在马神庙，张百熙在此基础上扩建和修复了一部分房屋。1903年又选定京西瓦窑地方的土地1300多亩，准备作为建筑新校舍之用，但西太后认为“铺张太过”，命令“暂作罢论”。由于八国联军的破坏，原京师大学堂的图书、仪器设备等已荡然无存。为了贮存图书，1902年张百熙在大学堂设立藏书局，将已刻经史子集及时务新书，每种提取10部或数部送京师大学堂，同时还设立译书局和编书处。其中译书局负责编译有关西学方面的课本和资料，编

书处负责编辑有关国学方面的教材。

京师大学堂的经费，规定仍从户部存放华俄道胜银行的五百万两银子的利息中支付。这项利息每年有 21.2 万两，全数拨给大学堂作为常经费；另由各省资助一部分，大省每年筹款二万两，中省一万两，小省五千两。

改善大学堂的办学条件，为办好这所学校创造了一个好的基础。怎样真正地、切实地办出特色，办出水平，作为全国学堂的楷模，这是摆在张百熙面前的重大问题。

首先，张百熙提出，应明确办学宗旨，调整培养目标。他认为办教育切忌盲目行事，应预定办法，明确目标。作为一校之长，对于学校如何办，办多大规模，今后朝什么方面发展，都要有清醒的认识。张百熙参照各国学堂之制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，提出了筹办京师大学堂的预定办法。他认为，各国学堂之制，大抵取幼童于蒙学毕业之后，先入小学堂，三年毕业乃升入中学堂，又三年，乃升入高等学堂，又三年，乃升入大学堂。从我国的情形看，小学堂即县学堂也，中学堂即府学堂也，高等学堂即省学堂也。清廷虽谕令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，但开办者尚无几处，因而目前暂无应入大学肄业之学生。如果大学堂一开办就招大学本科，将没有学生来源。因此，暂时不设立大学本科，先办预备科为本科作准备。预备科又分政科和艺科。以经史、政治、法律、通商、理财等事隶政科；以声、光、电、化、农、工、医、算等事隶艺科。预备科学生三年毕业，考试合格者可升入大学本科。又因为“国家需才孔亟，士大夫求学甚殷”，则另设速成科。速成科亦分二馆，“一曰仕学馆，二曰师范馆。凡京官五品以下，八品以上，以及外官候选，暨因事留京者，道员以下，教职以上，皆准应考入仕学馆。举、贡、生、监等，皆准应入师范馆”。速成科学生毕业后可担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。

其次，改革教师任用制度。凡京师大学堂教职工皆自聘。以往的教师，不管其教学质量如何，均可年复一年的教下去。有些外国教师实际上是传教士，他们利用课堂之便，传播宗教，搞奴化教育。管学大臣对之也无可奈何。张百熙掌管京师大学堂以后，规定自总教习至一般的教职工一律实行自聘，在《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》中专门设立“聘用教习”一章，每个被聘用者与学校签订聘任合同，合同书上明确每一个被聘用者的职责，聘用年限。如果“各教习教课不勤，及任意紊乱课程上之规约等事，无论中外教习、年满与否，管学大臣均有辞退之权。”。另外还规定西教习不得在学堂中传习宗教教规，“凡讲授科学，不得借词宣讲，涉及宗教之语，违者应即辞退”。为了加强对被聘用者的管理，章程规定“自副总教习以下，教课勤惰，均由正总教习按照章程严密稽察，年终出具考语，报明管学大臣查核”。这些规定的实行，保证了教师的教学质量，造成了大学堂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出现了一种好的气氛，那就是“无论中外教师，无论大小职员，都

看待学生象子弟一样，研讨学说，质析疑难，没有一样不亲切诚恳指导。所以学生非常敬爱教职员，教职员亦非常亲爱学生。”学生在这种轻松、愉快的环境中学习，感到其乐无穷，许多毕业生后来回忆这段学习时光时，“至今神往”。为了办好京师大学堂，张百熙还十分注意延揽人才，重视物色总教习人选。他认为“大学堂之设，所以造就人才，而人才之出，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，必得德望具备，品学兼优之人，方足以膺此任。”他经过多方了解，认为吴汝纶“学问纯粹，时事洞明，淹贯古今，详悉中外，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”。因此他“奏加冀州知州吴汝纶五品卿衔总教大学”。吴“坚辞不起”，表示不愿出任，张百熙便穿着大礼服跪在吴的面前不起来，并说：“吾为全国求人师，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。先生不出，如中国何！”吴汝纶才答应张百熙的请求。吴汝纶死后，张百熙又推举副教习张篔浦任总教习。此人是当时国内颇有影响的“阳湖派”（桐城派的一个流派）古文家。京师大学堂其它的国学教师如杨仁山等也都是海内知名人士。职员中如于式枚、蒋惺甫等都是积学之士。编译局的人才更多，严几通、罗东、魏聪叔是近代名人。他还聘请孙诒让、蔡元培、屠寄等充经史学教习，（孙、蔡因故未能到校）。难怪当时有人说，近人所知名士，统在张百熙的网罗之列。张百熙聘用教习，不仅注重教员的业务素质，而且也重视其政治修养。在选用教习上有较强的民族意识。这可从辞退丁匙良一事上得到说明。张百熙充任管学大臣不久，将过去在京师大学堂任教的外国传教士丁匙良等辞退。这件事引起不小的风波。尽管丁匙良等人多次与张交涉、并抗议，但张百熙也未作让步。

再次，张百熙在京师大学堂还进行了教学内容的变革。戊戌政变后，京师大学堂的课程仅设诗、书、易、礼四堂，春秋二堂，“竟竞以圣经理学诏学者，日悬《近思录》、朱子《小学》二书以为的”。1899年，原有各堂改名为立本、求志、敦行、守约，另立史学、地理、政治三堂。上午习经史，下午习科学。“士子虽稍习科学，然大都习制艺一编，占咩咩唔，求获科第而已。”担任经史课程教学的大都是翰林院的官僚腐儒。他们既不懂科学，又不懂旧学，名为讲解古代典籍，实际上不过是教一些八股文的作法，作为应付科举考试的手段。张百熙受命管理京师大学堂后，增加了许多西学的课程，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。如政科的课程是：伦理、经学、诸子、词章、中外史学、中外舆地、算学、外国文、物理、名学、法学、理财学、体操。艺科的课程是：伦理、中外史学、外国文、算学、物理、化学、动植物学、地质及矿产学、图画、体操。这些课程大部分是经世之学，有用之学，向学生灌输的大都是关于声、光、电化等方面的科学知识，变更后的课程中也有经学课，但在封建时代，在学校中不学习儒家经典，是不可能的。张百熙尽量减少它的比重，如政科一周36节课中，伦理、经学、诸子、词章四科加在一起也只有4个课时，只占一周总课时的1/9。艺科中经学科的比重就更小了，

一周 36 个课时中，仅有一个课时，微不足道。由于张百熙在课程改革上注意勾通中西，大学堂的学习空气大为好转。

正当张百熙满怀信心，雄心勃勃地想对京师大学堂进行切实整顿，对大学堂的未来颇多宏伟设想之时，顽固守旧派已看不惯他对大学堂的种种变革。特别是他举办新学，“尤为旧人所恨，蜚语浸盛。”顽固派“皆不善百熙所为”，因而张百熙每办一件事都是“阻力纷起”。尤其慈禧等人从西安回銮以后，不能容忍张百熙在大学堂所采取的旨在传播西学、勾通中西的兴学措施，决心要挑选一个最能代表他们意志的官员掺到大学堂去，稍分张百熙的权力，他们选中了荣庆。荣庆上任后，处处为难张百熙，多方牵制张的兴学计划。《清史稿·张百熙传》谓“大学堂既负时谤，言官奏称：本朝定制，部官大率满汉相维，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，乃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，旋别设学务处，以张嘉亨为大学总监督，百熙权益分。”说的正是荣庆牵掣张百熙这件事。荣庆被任为管学大臣后，“颇自专，百熙不能行其志”。越到后来，荣庆“益专制，百熙遂无二事可办矣”。由于荣庆等人的多方牵制，事事与张百熙作对，致使张百熙的许多兴学抱负无法实现。所以他心情很痛苦，对振兴京师学堂已失去信心，其致瞿鸿玕密札云：“二三年来，颇有退志，所以迟迟者，始则以东朝万寿，不能不一随班。嗣以学务羁身，难于摆脱，后复以东方事变，万无可言归之理。今东事粗定，但能开去学务，无论身居何部，冀可渐得自由。”观此函，我们即可了解到张百熙为人扼抑而不得伸其志的痛苦心情。张百熙在京师大学堂的改革，为何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呢？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。第一是张百熙思想甚新，又能延揽许多头脑较新的人物，重用了一批比较开明和进步的学者，因而遭到顽固派的猜疑和反对。第二“庚子后，一大新政，只有学务”，而当时管理学务的就是管学大臣张百熙，他“既有用人之柄，复掌财权，既杂用外吏，又薪俸厚，羨者多。”许多人都很羡慕这个位置，也都想坐上去，把张百熙挤下来。第三，清朝末年，有正义感的学人和青年士子对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越来越不满，他们纷纷将矛头指向清廷，一时革命风潮四起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清廷不得不加强对学生的管束。而张百熙对学人和青年士子爱国热情采取了认可的态度，因而引起了慈禧等人的不满。尽管如此，张百熙出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，还是苦力支撑，力任群谤，终于使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下来，因而，当 1907 年张百熙去世时“旧日生徒会祭者，皆痛哭失声”。

京师大学堂虽然由孙家鼐开办，但开创办学新局面的，却是张百熙。京师大学堂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，而张百熙之功不可没。

（章育良，原刊于《教育评论》，1990 年第 5 期。）